国家“985工程”（二期） 国家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成果

宗教文化大系

赖永海 主编

分析的宗教哲学

张力锋 张建军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国家“985工程”（二期） 国家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成果

宗教文化大系

赖永海 主编

分析的宗教哲学

张力锋 张建军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的宗教哲学/张力锋,张建军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6
(宗教文化大系/赖永海主编)
ISBN 978-7-214-05893-5

Ⅰ.分… Ⅱ.①张…②张… Ⅲ.分析哲学:宗教哲学
Ⅳ.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9719 号

书　　名	**分析的宗教哲学**
著　　者	张力锋　张建军
责任编辑	王　田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6.125　插页 2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893-5
定　　价	1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宗教文化大系”总序

“985工程”是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大举措，其二期工程在全国若干所重点大学创建了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创新基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重大课题进行一些开创性的研究。这次在南京大学建立的“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是以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为依托，整合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等相关院、系的有关研究力量组建起来的财政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基地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历史上特别是现当代各种宗教与文化普遍联系与深刻互动、各种宗教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作为重点课题。

“宗教文化大系”是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创新基地的系列研究成果集成。这些研究成果，既有试图从理论层面较深入提示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内在关系的“宗教文化专论”一辑五册：《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政治》、《宗教与伦理》、《宗教与文学》；又有着力于对世界五大宗教与五大文明系统之间相互影响进行相对宏观探讨的“宗教文化概论”一辑五册：《佛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伊斯兰教与阿

拉伯文化》、《印度教与印度文化》、《犹太教与犹太文化》。

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关系是创新某地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宗教文化大系”所推出的“东方宗教与哲学”的五部专著，对中国、印度和日本古代宗教与哲学相互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它们分别是：《儒释道三教关系》、《东亚道家与道教》、《印度宗教哲学》、《批判佛教的批判》。

利用南京大学宗教研究力量的资源优势，研究中心组织了早已把研究触角伸及宗教领域的八位南京大学教授，就他们各自学科、专业中的宗教问题，进行发掘性的专题性研究，作为成果，则是八部颇具特色和深度的研究专著：《宗教生命文化的哲学内蕴》、《佛教本土化研究》、《基督教哲学的源与流》、《圣经与西方审美文化研究》、《犹太教教义研究》、《什么是理性的宗教》、《宗教与逻辑》、《逻辑与宗教社会学》、《佛教逻辑发展史》。

对于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南京大学哲学系有几十年的研究传统，在海内外具有相当的影响。这次研究中心借助于创新基地这一平台，组织了一批专门致力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推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人学向度》、《中国无神论史与论》、《中国无神论与政治》、《中国无神论与自然科学》、《中国无神论与西方无神论比较研究》、《中国无神论与儒家》、《中国无神论与道家》、《中国无神论与佛学》等七部专著，把该领域的研究再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佛学研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队伍最整齐、研究力量最雄厚和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方向之一，十几年来该学科招收并培养了近百名以佛学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推出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佛学专著。“985 工程”（二期）在全国各高校所设立的有关宗教研究创新基地中，与其他几个基地或侧重于基督教研究、或侧重于道教研究不尽相同，“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则是一个以研究佛教文化为主的创新基地。“985 工程”（二期）启动后，从课题设计到投入力度，研究中心都把佛教文化的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作为创新基地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心组织了国内十多个高等院校及研究所的二十多名相关学者，经过五年多的集体攻关，终于完成了国内外第一部起自两汉之际，迄于民国时期，总 15 册，共 650 万字的《中国佛教通史》。

“创新基地”贵在“创新”，这也是我们在落实“985 工程”各项工作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但是正如宗教的产生就其终极原因说，乃是人的愿望与能力矛盾的产物一样，对于宗教的研究，人们也经常会碰到能力与愿望的差距问题，虽然研究中心所组织的以上六套系列专著，都力图在某些领域、某些问题上有所“创新”，但由于撰著者的学力所限，加之时间较紧，能否完全如愿，尚有待于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真诚期待着学界同仁对我们劳动成果的关注、批评和指正，以便于在今后的科研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升这些成果的品质；同时，也热诚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一行列，为把宗教文化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而共同努力。

赖永海

2008 年 11 月 6 日

目 录

导 言 逻辑与宗教对话 *1*

第一章 当代宗教哲学的“分析”之维 *10*

1.1 西方宗教哲学的现代际遇 *10*

1.2 分析的宗教哲学的兴起 *24*

第二章 上帝的本性问题 *29*

2.1 上帝的全能性 *30*

2.1.1 石头悖论 *31*

2.1.2 全能悖论 *38*

2.2 上帝的全知性与自由意志 *41*

2.3 上帝的永恒性 *46*

2.3.1 《圣经》中的“永恒” *46*

2.3.2 不同的“永恒”论 *48*

第三章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56*

3.1 安瑟尔谟的第一本体论证明 *57*

3.2 第一本体论证明的当代破解 *61*

3.3 模态本体论证明的当代重构 *68*

3.4 一个“完美的”模态本体论证明 81
3.4.1 基本概念及论证工具 82
3.4.2 基于可能世界理论的上帝存在证明 86
3.4.3 可能世界理论本体论证明的精确塑述 88
3.5 本体论证明的逻辑反思 95
第四章 “恶”与“苦难”疑难 100
4.1 恶的逻辑疑难 101
4.2 自由意志之辩 108
4.2.1 反事实情形 110
4.2.2 莱布尼兹过失 116
4.2.3 跨世界堕落 119
4.3 恶的实证问题 126
4.3.1 罗伊式问题 126
4.3.2 神义论及其诸种形态 131
第五章 宗教认识论 137
5.1 证据主义 137
5.2 累积式论证与宗教经验的可信性原则 144
5.3 宗教经验的认识论本性 153
5.4 反证据主义和改革宗认识论 162
结 语 172
主要参考书目 175
索 引 179
后 记 187

导　言　逻辑与宗教对话

“分析的宗教哲学”研究的蓬勃兴起，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当代西方宗教与文化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亟待我们予以关注与研究。要理解这一重要思潮的来龙去脉，需首先了解其兴起的两大相互关联的重要背景：一是20世纪下半叶“宗教对话”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展开，二是逻辑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转向”，二者共同促成了逻辑（及分析哲学）与宗教哲学之间由疏离与互斥走向新的联姻与互动。

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文化交流与融和的需求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开展文明对话、构建和谐世界，已成为时代强音。在各种形式的文明对话中，宗教对话无疑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德国著名天主教神学家、宗教对话的倡导者之一孔汉思（Hans Küng）被广为引用的名言：“当今世界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广泛对话就没有宗教的和平”，可谓醒世至理。所谓“宗教对话”，可分为两个明显有别但又相互作用的基本层面：一是宗教之间的对话，二是宗教与各种无神论之间的对话。细分起来，又有宗教间双方对话与多方对话，某宗教内部各宗派间的对话，各大宗教传统与

各种世俗思潮或理论体系的对话，宗教伦理与政治、经济、生态伦理的对话等多种交叉重叠的形式。“宗教对话不仅范围广泛内容复杂，而且实属一种跨宗派、跨信仰、跨文化、乃至跨意识形态的艰难尝试。”[①]然而，无论是哪个层面、哪种形式的对话，既然都抱有“从冲突到对话”的基本诉求，就必然要历经通过辨析共识而“求同存异”的过程。显而易见，在这样的过程中，无论以“别同异”为特征的形式逻辑，还是以“合同异”为特征的辩证逻辑，都应当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至于宗教对话的理论研究，诸如宗教对话的前提、模式、方法、目的、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逻辑工具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众所周知，逻辑学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创生并发展起来的，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正是在其主要哲学著作《形而上学》中阐发了逻辑学的基本法则——矛盾律与排中律，从而为逻辑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西方逻辑发展在中世纪后期形成的第二大高峰期，更是在基督教经院哲学的怀抱中生长与发展的。但由于逻辑学本身的科学本性，经院逻辑学在冲破中世纪的黑暗，建立近代科学与实现宗教改革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期间逻辑学始终是宗教哲学各流派所使用的基本工具。但是，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所实现的现代逻辑革命，使得逻辑与宗教哲学的关系发生了疏离。建立在真值函数论基础上的现代逻辑的创立与发展，使得逻辑学最终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并成为在当代学科体系中与数、理、化、天、地、生相并列的基础学科。但逻辑学毕竟具有比其他基础学科更强的“人文性”，作为一种崭新的分析工具的现代逻辑反作用于其母体，即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分析哲学运动，导致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以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为代表的前期分析哲学家，以现代逻辑的理论与方法作为解构一切独断教条的犀利武器，大多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信条采取了拒斥态度，宣布它们只是一种主观情感或体验的产物，属于不可能得

① 张志刚：《宗教研究指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5 页。

到合理辩护的无意义命题,“连假的资格都没有”。逻辑实证主义者更是打出了“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旗帜,所有导致“本质主义”的学说都被宣布为虚妄。因此,就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学界主流而言,逻辑及分析哲学与宗教哲学之间在数十年间处于相互排斥状态。

然而,时至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60年代之后,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解决现代模态逻辑难题而创建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导致了现代逻辑的“哲学转向”:以真势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为核心的哲学逻辑学科群蓬勃兴起并日益显示出其多方面功用,同时也为本质主义在分析哲学中的复活提供了可能。在此背景下,以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和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为杰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分析哲学家,发起了一场遵循逻辑分析基本范式的新型“护教”运动。他们娴熟地运用现代演绎逻辑与现代归纳逻辑的成果,重新论证了基督教的一系列基本信条,并围绕上帝的基本属性(全知、全能、全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恶与苦难疑难、宗教经验(神秘体验)与神迹、死亡与不朽及理性与信仰的基本关系等核心问题,以及启示、救赎、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基督教的具体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辩。论辩既在护教者与无神论者之间进行,也在护教者内部展开,其规模可与中世纪经院逻辑学者之间有关“唯名论”与“唯实论”的长期论辩相媲美。“如果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使用传统逻辑的方法(即他们所谓的辩证法)把信仰加以系统化和深化,(当代)英美基督教哲学家使用现代的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①]长期论辩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分析哲学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具有分析哲学背景的学者纷纷加入了“护教”阵营,甚至连20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哥德尔(Kurt Gödel)也加入了用现代逻辑方法论证“上帝必然存在”的行列。[②] 成立

① 赵敦华:《〈当代西方宗教哲学〉中文版前言》,载《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参见王浩《哥德尔》,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于1978年的“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协会”现已成为“美国哲学学会”下属的最大分支机构,成员达一千多人。

正是通过这样的论辩,“分析的宗教哲学”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得以确立并获得持续发展。纵观这场持续几十年、参与者众多的论辩,可以看出其具有如下特点:

(1) 论辩参与者从最坚定的排他主义信仰者、宗教多元论者到最坚定的无神论者,具有各不相同的立场,但都努力掌握与运用现代逻辑工具,普兰丁格等人本身就是颇有成就的逻辑学家。

(2) 论辩者所使用的逻辑分析工具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演绎逻辑,有的侧重于归纳逻辑,有些参与论辩的具有欧陆哲学背景的学者则体现了一定的辩证逻辑思想。

(3) 尽管论辩难免“唇枪舌战”,但大多数论辩参与者都对论辩对手的信仰特别是其逻辑论证给予了充分尊重,并努力“同情地”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揭示预设、辨析共识”的方法在论辩中得到了充分运用,明显的求同存异的诉求使论辩取得了“螺旋式上升”的丰硕成果。

(4) 论辩既显示出现代逻辑工具的普适性效力,同时也暴露出了现有逻辑工具的许多重要局限,显示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逻辑工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有些学者(如本书所要着重研究的普兰丁格)在论辩过程中同时从事现代逻辑的发展工作,并取得了关于宗教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与经验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别与关联的一些新的规律性认识。

实际上,这场论辩可视为逻辑在宗教对话中的作用的一次集中体现。尽管争论主要是围绕基督教而展开的,但无神论者和宗教多元论者的参与,使其具备了在“宗教对话”上的典型价值。通过论辩,在澄清概念、分辨层次、清理矛盾、严格推证的基础上,透过看上去“不可通约”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多重冲突,有关“终极关怀”、“永恒追求”及与之相关的多层次共识性信仰与价值规范(包括正向规范和负向规范)得到了进一步澄清与确认。宗教多元论者、当代宗教对话理论的主要开拓者希克

(John Hick)曾就此总结说:“在其最根本的道德共识,伟大的传统都运用了一个共同的标准。因为它们都赞同给予我们称之为爱或同情的对别人的无私关怀以核心的和规范的地位。这在珍视别人正如珍视我们自己并相应地对待他们这一原则上得到了共同表达。”就所有主要宗教的共性而言,“我们的宗教经验,受到我们的宗教概念套数的多样化塑造的,是对终极神圣实在的普遍临存的认知回应,这实在本身则超出了人类的概念化能力。这实在显现给我们的方式是由诸多种类的人类概念形成的,宗教史上的神圣位格与形上非位格都见证了此点。每一主要传统,围绕着它自己的思考及体验实在的独特方式建立起来,都发展出了它自己的对我们的起源及命数的永久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或多或少综合的和逻辑上一致的宇宙论和末世论。”[①]这些共识性信仰与规范在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不同表现及其差异之缘,信仰体系间的“不可通约性”及其历史根源,在论辩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呈现与深入探讨。这种同与异不仅体现在不同宗教之间,而且也体现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流派之间;不仅表现在不同信仰之间,也表现在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经过多层次辨析与整合,各种宗教思想之间可以形成一个既有连续性又有间断性的家族谱系,而逻辑分析可以使这种谱系得到比较清晰的呈现。

这场论辩所提供给我们的另一重要启示,是如何正确把握逻辑思维在宗教对话中的角色定位。逻辑是人类理性的支柱,但不可由此推断,在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的争论中,逻辑必定站在理性主义一方;正如不可由此推断,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与意志主义的争论中,逻辑必定站在理性主义一边一样。就后两者而言,现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表明,逻辑并不是理性主义的附庸,而是在理性与经验之间、理性与意志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的工具;同样,逻辑也是在理性与信仰之

① 约翰·希克:《宗教多元论与拯救》,载《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82、690 页。

间维持必要的张力的工具，这个道理在上述论辩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确证。此外，逻辑之于不同信仰的相对“中立性”，在这场论辩中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不同的信仰体系可以使用相同的逻辑工具展开论证。但是，对这种“中立性”切不可做绝对化理解。对论辩的深入辨析可以见得，人们所侧重使用的逻辑工具不同，有可能对其认知与信仰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会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如果我们运用上述启示来看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宗教对话，可以获得关于逻辑在宗教对话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的一些基本认识。

首先，由于逻辑工具所具有的相对中立性与普适性特质，置诸宗教对话之中必定具有分辨同异、把握同异关联的基本方法论功能。诚然，从根本上说，展开宗教对话的可能性乃缘于历史唯物论所揭示的不同信仰共同体所处社会历史条件方面的同异，然而，如果不尊重逻辑、不尊重论证，则良性的建设性对话就不可能展开。近年来，有的国内学者遵循历史唯物论的大思路，主张应从人类的实际生存处境入手把握各种宗教体系之“同”，从而探讨宗教对话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并据此批评希克等人的多元主义理论脱离了宗教的历史形态和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抽象性、非历史性或超历史性，因而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与之相关，这种理论混淆了哲学理论与宗教信仰，忽视了宗教对话的层次区分，特别是宗教信仰层面和宗教文化层面的区分，因而不可能指明良性宗教对话的现实道路；进而颇具见地地指出，如果清楚地区分上述层次，从而把握对话中的“文化中介”和“生存体验中介”，就可以找到宗教对话的现实途径和基本模式。[①] 实际上，这样的探讨已使得逻辑工具的作用呼之欲出。帮助人们清楚地辨析各种不同层面，进而清楚地把握各层面间的系统性、规律性关联，正是逻辑的一种基本职能，对于任何学科研究都是如

① 参见段德智《试论希克多元论假说的乌托邦性质》，载《基督宗教研究》第4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试论宗教对话的层次性、基本中介与普遍模式》，载《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此,对于一种“对话”理论则更为至要。

其次,开展宗教对话必须注意各种信仰共同体之间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恰如费尔巴哈所言:“每一特点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都同时又是一种思维方式。”[①]思维方式的不同源于历史地形成的逻辑思维主导类型的不同。我们已注意到上述论辩中不同参与者在思维类型上的差异,不过从总体上说论辩中仍以形式逻辑思维占主导地位。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如果把这场论辩置于欧陆哲学语境中,同样是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争论,其面貌就会发生一定变化,辩证思维方式就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就大尺度来说,比如就基督教、佛教和我国的道教的思维传统的比较而言,可以明显地发现演绎思维方式、归纳思维方式与素朴辩证思维方式在思维主导类型上的有序化过渡。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对各种信仰系统的内在气质和风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是在宗教对话中必须予以高度关注与深刻把握的。因此,深入考察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宗教文化互动发展的历史进程,应作为把握逻辑在宗教对话中的作用机理的基础性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强调指出,逻辑思维工具毕竟是具有普适性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沟通、理解、交融与互济,正可为开展宗教对话搭建“逻辑之桥”。可以期待的是,我国以“和而不同”为基本特征的辩证思维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在宗教对话与融和方面的历史经验,必定在当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再次,宗教对话不是单个人的孤立信仰之间的对话,而是信仰共同体信仰系统(必附之以知识系统)之间的对话。而逻辑不仅是认知共同体的公共知识系统化的工具,也是信仰共同体的公共信仰系统化的工具。如何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是人类社会文化良性发展的永恒主题。逻辑作为维持这种张力的基本工具,既是反对一切盲目迷

① 转引自赖永海《宗教学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03 页。

信与宗教极端思想的利器，也是反对一切信仰霸权主义，促进信仰共同体之间的良性对话与互动，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谐发展的基本思维装备。不过，这种装备虽然在20世纪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从当代社会实践的需要来看已经显示出其多方面局限性。我们说要为宗教对话"搭建"逻辑之桥，而不是简单地说"提供"逻辑之桥，正是因为现有逻辑工具本身还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正是在逻辑应用的现实需要的有力推动下，当代逻辑科学呈现出基础逻辑、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互动发展的繁荣势态。[①] 如本书所显示，当代模态逻辑及哲学逻辑学科群在分析的宗教哲学研究的兴起及相关宗教对话的展开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近来产生的一系列新型逻辑理论中，对宗教对话的逻辑研究可能发挥独特作用的当推"非形式逻辑"、"情境语义学"、"公共选择与行动逻辑"和"亚相容(次协调)逻辑"。其中非形式逻辑致力于系统考察形式逻辑在实际的非形式论辩中的应用机理，亚相容逻辑直接试图刻画人类在"由冲突走向对话"中"求同存异"的逻辑机理，公共选择与行动逻辑有益于把握公共信仰与群体行动的选择与改进的逻辑基础及在此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作用的实在机制，情境语义学则是试图把历史—现实情境因素引入逻辑系统的崭新理论，被称为"社会实践论的代数学"，已经在解决人类理性思维的古老难题——逻辑悖论及一系列类悖论二难问题上显示出其强大功能，凡此种种，都为发挥逻辑在宗教对话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同时，这些工具也必将在应用中获得新的发展，从而更好地适应宗教对话等社会实践的需要。

由于种种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特定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范式，我国学界对于现代逻辑及分析哲学与宗教哲学的关系的重大转变及上述论辩长期缺乏关注，只是近几年才有所改观，比如在北京大学《未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中出版了上述论辩的一部译文集《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和几

① 参见张建军《当代逻辑科学"应用转向"探纲》，《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

部有关译著，这是我国学者与“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协会”学术交流的产物，但相关研究仍非常初步。总体上，对分析的宗教哲学的研究仍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我们认为，加强对分析的宗教哲学的把握与研究，需要我国逻辑、哲学与宗教学各界的合力攻关。本书基于我们所把握的有限资料及学力所及，力图对当代分析的宗教哲学研究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前述核心问题的论辩予以比较深入的评述与讨论，旨在推动我国学界有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